

中国历史统一趋势研究

——从唐末五代分裂到元朝大一统



地域文明研究书系

王德忠 著



商务印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地域文明重点问题”结项成果

中国历史统一趋势研究

——从唐末五代分裂到元朝大一统

王德忠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统一趋势研究:从唐末五代分裂到元朝大一统/王德忠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
ISBN 978-7-100-07507-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国家统一—研究—中国—唐代~元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6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历史统一趋势研究
——从唐末五代分裂到元朝大一统
王德忠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507-7

2010年12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3 5/8
定价:29.00元

序 言

统一趋势的不断增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著名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历史上东汉末年军阀豪强称雄割据背景下社会形势剧烈动荡、分合无定势现象的直观描述。其实，这种分分合合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是一种有着周期性规律的现象。正是与这种分分合合的过程相伴随，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的趋势不断酝酿发展，到元朝终于完成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统一，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尽管每个分合周期的延续时间和历史背景及基本特征都有所差别，而在统一趋势不断酝酿增长的过程中，从先秦时期的华夏到后来中原的汉族王朝的主导作用则是一致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一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分合变动主要有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先秦时期，其时间断限上自夏朝建立的公元前 21 世纪，下迄秦国完成全国的第一次大统一。夏朝是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建立夏朝的是兴起于黄河中游的夏族，建立商朝的是兴起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商族，建立周朝的是兴起于西部黄土高原的周族。至周朝，在经历了以夏、商、

周各族为主体,吸收了周边各族成分的基础上,华夏族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①。从此,文献把当时的民族主要按照是不是实行礼仪制度分成先进和落后的华、夷两大类。

在夏商周时代,夏族、商族、周族分别是当时人数较多、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在周边地区还存在着许多人数较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和小规模的诸侯国,他们与夏商周已经发生了经常性的政治、经济交往。对于这些民族,《周礼·职方氏》中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概括,而在《尔雅·释地》中概括为九夷、八狄、七戎、六狄。这些民族与华夏族在经济生活和文明程度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矣”^②。

在第一个周期中,从先秦文献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商、周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通过战争或朝贡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春秋以后,在诸侯国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周边的夷、蛮、戎、狄的力量也强盛起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活动开始对诸夏地区的社会形势产生影响,即在当时造成社会动荡的因素中,除了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还有在诸侯国与夷、蛮、戎、狄诸部族之间发生的战争与会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主张诸侯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狄,足见戎、狄等周边部族势力之大。这样的社会形势给周边诸部族融入诸夏提供了契机。结合当时人对于夷狄等部族的

① 《左传》定公十年。

② 《礼记·王制》。

议论,可见当时人的民族观念中既有把夷狄与诸夏视为一体的言论,也有贵诸夏、贱夷狄的言论,尤其是后者,对后来儒家的华夷观有很大的影响。

进入战国,周边诸部族融入诸夏的速度大大加快,至七雄并立的时代,原有的诸夏与诸部族参差杂居的分布格局已经完全改变,形成了以七个诸侯国为中心的、周边与诸蛮夷为邻的新格局。东方的齐国早已经完成了对东夷部族的融合,北方燕国的人口加入了許多北狄的成分,中原的韩、赵、魏三国的人口加入了大量西戎和北狄的成分,而南方的楚国则把百越等部族吸收为属民。甚至像秦、楚、吴、越这样原来被视为蛮戎的国家也加入了诸夏之列。就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就融入诸夏的诸部族本身来说,摆脱了落后野蛮的社会环境,开始成为穿戴衣冠、讲究礼仪的编户,从保障性很差的畜牧业转而从从事农耕生产,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大步跨越。同样,在春秋以来诸部族融入诸夏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和生活风俗也对诸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春秋时期诸侯国礼仪、音乐、舞蹈所加入的蛮夷的成分,而战国时期赵国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在中国服饰史、军队作战方式史、生活方式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秦国所完成全国大统一的胜利条件中,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国力和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是毋庸置疑的,而七雄并立以后在诸国的国家制度、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日益趋同基础上逐渐显露的统一趋势,则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统一的历史走向。秦国的统一行动正是由于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才得以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

至公元前 221 年,秦国完成统一“诸夏”的大业,建立起疆域空

前辽阔和政治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秦朝的统治下,除了通过设置郡县的办法,加强了对于原六国统治地区的控制外,还对边疆地区大规模用兵。派遣尉屠睢率军进攻百越,在闽越故地设闽中郡(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故地设南海郡(今广东广州)、桂林郡(今广西桂林)、象郡(今广西崇左境),又迁 50 万罪徒至岭南地区与越人杂处,促进了越人与中原地区人口的交流,加强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派遣常頌率军经略今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修筑了自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的“五尺道”,在夜郎、滇、邛等地派驻官吏,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西南夷与内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派遣大将蒙恬率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今河套)地区,在这里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境),迁徙中原农民来这里进行垦殖。又对原来秦、燕、赵等国修筑的防御匈奴的长城进行修葺、连接,形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傍阴山,经蒙古草原和华北山地结合部,直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成为秦朝和后来中原诸王朝防御北方民族南下的屏障。

从秦国统一六国到秦朝对边疆地区的经略,不仅把战国末年的诸华夏国家变成大一统的国家,而且把分散的华夏族统一为一个华夏族。秦朝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原六国故地的统一局面,奠定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基础,为两汉时期华夏族与周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新阶段的到来,尤其是为后来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二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分合周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时间

断限上起东汉灭亡后国家分裂,下迄隋朝实现南北的大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在秦统一后出现的第一次分裂局面。东汉王朝在内部政治纷争和农民战争的双重作用下,国家的统治能力被大大削弱,逐渐演变为军阀割据的局面。以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为标志,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曹操图谋挥师南下、进一步兼并长江流域而完成全国的统一之时,因受到割据江南的孙权和依附于江陵刘表的刘备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于孙、刘联军,奠定了后来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的基础。继之因刘、吴之间对荆州(今湖北江陵)的争夺发生的“夷陵之战”,正式确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

三国之间尽管在政治、军事上是彼此对立的,但在经济上的联系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例如吴以香料、珠宝向魏交易战马,魏、吴二国远赴蜀地购买蜀锦等。在这种特别的政治形势下,三国各自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略是引人瞩目的。曹魏在北方边疆的经营状况,大体是在打败乌丸的入寇后,为加强对东北各民族的控制,设置护乌丸校尉和护鲜卑校尉,封鲜卑酋长为王,与之进行互市贸易,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魏明帝时派司马懿率军平定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在襄平(今辽宁辽阳)置平州,统领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并且设东夷校尉,掌管夫余、高句丽各民族事务。濊貊、夫余、挹娄等族都先后遣使朝献。幽州(今北京)刺史毌丘俭还两次率军征伐高句丽。为妥善解决东汉以来的南匈奴问题,在晋阳设护匈奴中郎将,变部族统领下的匈奴人口为曹魏直接管理,成为曹魏稳定边疆的军事力量。在西北地区,先后平定了河西诸郡的叛乱,稳定了当地的形势,使西域的鄯善、龟兹、于阗等地的诸部遣使朝献。曹魏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设戊己校尉和沿置

东汉西域长史府管辖西域广大地区的事务。

蜀汉在诸葛亮的主持下,为巩固后方而致力于今四川西南和贵州西部的南中地区的经营,对这里的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对于敢于反叛的南中大姓采取武力镇压的措施,特别是通过对孟获的“七擒七纵”,使其诚心归附,最终平定了南中地区。蜀汉在这里设置郡县,派遣官吏,征发少数民族壮丁为士卒,任用其渠帅为地方官吏,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大兴屯田,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帮助当地各民族发展生产。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经营,不仅达到了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后方、增兵增财、提高国力的目的,而且继两汉之后进一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管辖,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密切了西南各民族与内地汉族的联系。

孙吴为了巩固在江南地区的统治,特别是为了增加劳动力资源和扩大士兵的来源,对居住在今浙江、江西、福建等山区的山越进行长期的讨伐和掳掠,大批的山越被编入军队,成为孙吴豪门大姓和军队将领的部曲、田客。这一措施尽管是建立在对山越的掠夺和压迫基础之上的,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闭塞落后局面,促进了经济的开发,而且山越因此走出深山,很快融入汉族共同体。孙吴在东汉之后,对交州、广州地区继续进行管辖,进一步保持了南部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孙权时期还派遣卫温等率军渡海到达夷洲(今台湾),尽管没有派官行使管辖权,但却加深了对台湾的了解,为后来发展与台湾的经济文化联系准备了条件。

西晋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实现了这一周期中短暂的统一,继承了魏、蜀、吴三国分立时期各自经营的势力范围,其疆域大抵保持了东汉统一时期的规模。这一时期引人瞩目的现象是自东汉

末年以来北方各少数民族大批内迁又掀起高潮，在西晋腐朽统治和包括汉族及北方各少数民族参加的反晋斗争的共同打击下，西晋王朝覆灭，短暂的统一局面结束，形成以在江南立国的东晋及宋、齐、梁、陈为代表的汉族政权与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北朝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东晋的建立，使原来一直处于黄河流域的汉族文明也随之转移到江南，东晋以华夏正统为旗帜，得到了广大汉族地主阶级和庶民百姓的支持，北方汉族社会各阶层人口的大南迁，不仅壮大了东晋在江南立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江南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条件。而东晋的统治阶级反思西晋内乱造成国家覆亡的教训，加强统治集团的团结和统一，采取切实措施安抚来自北方的各阶层流民，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很快使东晋的社会形势稳定下来，有力量与北方政权长期对峙。

这一时期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被统称为“五胡”，先后在北方地区建立起 20 余个政权，但在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十六国时期。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东起辽东、西迄今甘肃青海的北方广大地区，与汉族杂处，在关中达到了“戎狄居半”^①的程度。西晋统治时期，曾经对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采取过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剧烈的反抗斗争。以江统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从儒家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观念出发，提出所谓“徙戎论”，即以武力将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强制遣返回他们的原居地。“徙戎论”违背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企图靠强制力量

① 《晋书·江统传》。

改变民族交往和民族杂居的现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当时的西晋朝廷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政策中,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色彩,导致民族矛盾激化,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形势动荡不安,使北方先进的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的破坏。但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集团通过对汉族农耕经济及其先进文化逐渐加深了解,开始改变其统治政策,逐渐接受和采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和办法治理国家。例如,刘曜建立的前赵,就在长安设立学校,延聘汉族学者教授儒家传统文化,任用大批汉族官员管理国家事务。建立后赵的石勒曾经为报复西晋的压迫政策而对汉族大肆杀戮,从王公卿士到庶民百姓都不能幸免。但是,当他认识到离开汉族官僚士大夫的合作就不能在中原立足时,他转而开始极力笼络汉族的世家大族,借鉴中原王朝的制度来管理国家政务,大力任用汉族官员,安抚流亡,减轻剥削,使后赵境内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力量不断增强,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地区。

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在苻坚在位时期,在汉族官员王猛的协助下,厉行法制,整顿吏治,选贤任能,奖励农桑,发展生产,恢复教育,改善民族关系,使前秦统治的关中地区呈现出社会稳定和企业文化全面恢复的良好态势,而前秦也成为十六国时期国力最强盛的政权。

十六国时期大批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中原农耕地区,最初仍然保持着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与汉族人口杂居相处,并仍然保留着他们原有的部落社会组织形式和游牧生产及生活方式等。但是,随着政权更迭及其统治中心的不断变动,各民族人口的不断流徙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种反复频繁的迁徙彻底打破了各民

族小集中的聚居格局,特别是在中原农耕生产的影响和带动下,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了畜牧生产,开始从事农耕活动,并从转徙不定的生活状态走向定居生活。各游牧民族的部族组织、生活方式等开始发生变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民族融合的趋势已经显现。十六国末年北方地区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为北魏实现中国北方地区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淝水之战”后,前秦灭亡。被前秦灭国、曾经在北方建立过代国的鲜卑拓跋氏乘机复兴,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改国号魏,是即北魏。北魏先后灭亡了大夏、北燕诸国,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魏在孝文帝时期进行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以全面“汉化”为特点的深刻变革,标志着北魏的主体民族鲜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实现了重大进步,这种历史跨越是建立在北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联系更加广泛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客观上大大加速了当时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此后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很少再有关于氐、羯等游牧民族活动的记载,说明他们已经主要融入汉族的民族共同体之中,民族矛盾已经在北方社会矛盾中退居次要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北魏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变革顺应了北方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北魏统治下北方社会形势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尽管由于北魏统治集团的腐朽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形成东魏、西魏分立的局面,但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形成的北方社会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 577 年),北周灭亡北齐,中国北方重新实现统一。在江南立国的陈正值陈宣帝在位的后期,由于统治腐朽,

国力走向衰弱,在与北周的军事对峙中仅能招架而已,南北之间在力量对比上的平衡态势已经被打破了。但是,北周武帝去世后,静帝即位,政局陷入动荡,外戚杨坚乘机谋划篡夺皇权,使北周王朝与南北的统一大业失之交臂。

隋朝建立后,陈后主统治下的南陈更加腐朽衰弱,隋朝的力量优势更加突出,终于在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灭亡南陈,统一全国。隋朝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三个半世纪的国家分裂,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南北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从彼此对立走向相互联系交流的产物。隋朝之所以能够完成国家的重新统一,不仅仅在于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对南朝的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南北朝以来南北方的社会发展中有利于走向统一的社会因素不断增长,使隋朝的统一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首先,南北朝以来北方的社会形势得益于北魏的统一而逐渐稳定下来,社会经济呈现出恢复和发展的势头,各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者实行的汉化措施则使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来;而南方则由于相对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北方大量人口的迁入,以及历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的措施,推动了南方的开发,使南方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东晋十六国以来南北方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已经缩小。其次,民族矛盾已经大大缓和,南方各汉族王朝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王朝之间虽然仍处于政治对立的状态,但在民族关系上如同从前南方汉族斥北方各少数民族为“索虏”、北方汉族污南方汉族为“岛夷”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北方的民族矛盾得到明显缓和,伴随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大杂居局面,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接触和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渐趋一致。一些王朝的统治者通

过与汉族社会上层的接触,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在态度上经历了从排斥、逐渐理解直至接受的过程,提倡和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对于推动北方文化的恢复和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逐渐摒弃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转而采取有利于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政策,有力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不仅在总体上接受了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在语言、姓氏、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汉化”倾向。北方的汉族不仅由于不断接受其他的民族成分而使民族共同体日益扩大,而且也从内迁的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学习和吸收了新的文明因素,例如畜牧业的生产经验、胡服、胡乐、胡舞,进一步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复次,在南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彼此间的经济交往也发展起来,全国经济联系走向恢复的客观趋势,要求打破这种人为的政治分立和阻隔状态。

隋唐时期迄“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相对长期的政治大一统时期。隋唐王朝的强大和繁盛,不仅表现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更加严密和完备,依凭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实现了对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诸领域的稳定控制,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民族关系呈现了活跃的局面而又处于中央政府的驾驭之下。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涵来说,隋唐的强大和繁盛是对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各民族、各王朝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的继承,即隋唐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文明既包括了秦汉以来汉族的文明因素,也包括了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的文明因素。在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既有以传统儒学为主对佛、道学术思想的吸纳,也有以中

原汉族文化为主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吸纳。

三

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分合周期是从唐朝中叶开始,直至元朝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为止。以唐朝天宝年间发生的“安史之乱”为标志,统一、繁盛的大唐帝国的历史结束了。就全国的政治形势来说,中原地区藩镇的割据混战取代了从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严密控制,民族关系再度活跃起来,周边各民族对唐朝俯首称臣、络绎来朝的局面不再。在“安史之乱”以后,在周边地区虽然没有出现如同东、西突厥那样对唐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少数民族,但是周边各民族的普遍崛起和向中原地区的运动,还是给唐朝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周边民族与内地的藩镇割据相互呼应,是推动唐朝中后期统治走向衰弱的重要因素。

回鹘是与唐朝保持了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安史之乱”发生后,回鹘曾经两次应唐朝的请求出师协助平叛,使回鹘与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唐朝曾经三次以皇帝的亲生女儿下嫁回鹘可汗。回鹘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区域建立起幅员辽阔的政权,乘唐朝力量衰弱的机会,频频向唐朝施加压力,特别是每年在对唐朝的马匹贸易中,屡屡以羸马交换唐朝的丝织品,直至唐文宗、武宗年间,因北方草原连年自然灾害,以及回鹘内部的叛乱,使回鹘汗国的力量大大削弱,在受到其西北的黠戛斯的打击后,回鹘汗国崩溃。

唐高宗时期,青藏高原的吐蕃向西域扩张,曾经占领安西四镇,“安史之乱”后,又乘唐朝调动陇右军队赴内地参加平叛战争的

时机，夺取了河湟和陇右地区，并且长驱直入，进兵关中，直抵长安（今陕西西安）城下，大肆杀掠，给唐朝造成极大威胁。直至公元9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吐蕃的内乱，其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才使唐朝受到的压力大大缓解。尽管吐蕃势力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活动在河湟地区，但由于部众分散，不相统一，在五代、北宋时期都未能形成很大气候。

在西南地区立国的南诏政权的统治者皮逻阁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曾经作为附属唐朝的地方政权而存在。但是，几乎在与“安史之乱”同时，由于唐朝军队将领对南诏的欺压，破坏了彼此间的和睦关系，导致了双方的兵戎相见，而且恰逢吐蕃势力向南诏地区的大肆扩张，南诏被迫依附于吐蕃，并随吐蕃进攻唐朝。此后，南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大大松弛。

自唐朝初年以来由今四川北部和青海东部内迁至今甘陕地区的党项族，由于其自身力量的限制，始终处于唐朝的保护之下。但在“安史之乱”后，党项与唐朝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随着唐朝对西北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党项经常在吐蕃的胁迫下进入州县地区寇掠；二是由于唐朝边将对党项的勒索和欺压，经常引起党项的反抗。党项基本上对唐朝保持了恭顺的态度，特别是其中的拓跋部，与唐朝的关系尤其密切。随着吐蕃势力的逐渐衰弱，党项的生存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并逐渐形成了以平夏地区（今陕西北部）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由于党项酋长拓跋思恭率部参加了唐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的战争，唐僖宗以其作战有功，任命为权知夏绥银节度事、赐姓李、晋爵夏国公，又赐夏州号定难军，拓跋思恭摇身一变而为唐朝的藩镇之一。唐末五代，在历代定难军节度使的经营下逐渐形成稳定的势力范围，与中原地区藩镇割据和连年战

乱的形势不同,“独银、夏、绥、宥、静五州,兵不事征战,民不睹金戈,休养生息,几及百年”^①。由此奠定了后来的西夏在西北地区立国,并长期与北宋、辽朝、金朝对峙的基础。

由夫余王子朱蒙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建立的高句丽,利用了其立国的鸭绿江流域远离中原的条件,特别是利用了东汉以后中原政治分裂的有利时机,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政治中心由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先后迁移至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平壤(今朝鲜平壤),在长期的对外扩张中,先后攻占汉乐浪郡和沃沮居地,向西多次进兵辽东、玄菟等郡,先后与东汉、曹魏、北魏等王朝发生过冲突。最后形成东临日本海,西抵辽河,西北至第二松花江,南至今朝鲜半岛汉江以北的地方政权,并且向北魏等王朝称臣。隋朝统一后,与高句丽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避免,尤其不能容忍高句丽向辽西地区的扩张。在隋朝数次对高句丽遣使警告无果后,双方曾经几次兵戎相见,尤以隋炀帝时期对高句丽的征伐规模最大。唐朝在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与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的新罗联合起来灭亡高句丽,高句丽族或四散逃亡,或被唐朝强制迁徙各地,并逐渐淡出历史记载。

靺鞨古称肃慎,汉代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靺鞨分为数十部,广泛分布于今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北部以及今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滨海地区。其中,有影响的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七部,又以粟末、黑水二部最强。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于公元698年自立为震国王,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在其控制地区设忽汗州都督府,册封他为渤海郡王、忽汗州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